

从冲突到和解: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演进*

张向荣

内容提要 土耳其族问题一直是保加利亚国家治理中的重要问题,也是影响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关键问题。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变化导致历史上出现土耳其族间歇性的移民潮。20世纪80年代中期,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强迫改名和同化政策,使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严重恶化,并引发了二战后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移民浪潮。冷战结束后,随着保加利亚入欧进程的开启和保土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土耳其族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与主体民族保加利亚族实现了政治和解。保加利亚对于土耳其族问题的治理经验和教训,为类似民族问题的解决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关键词 保加利亚 土耳其族 民族政策 国际关系 欧盟

土耳其族是保加利亚最大的少数民族,也是巴尔干规模最大、分布最集中的境外土耳其人群体。自19世纪末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以来,国内的土耳其族屡遭保加利亚政府的歧视和压制,出现多次间歇性移民潮。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的排斥在1989年达到顶点,当时保加利亚强化了1984年提出的所谓的“复兴进程”,迫使30多万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逃往土耳其,给土耳其造成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压力。作为二战后国际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突发性移民潮,这一事件在当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关注。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保加利亚族与土耳其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成为影响保加利亚国家建构和国家治理的重要问题,还成为影响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关系的关键因素。冷战结束后,随着保加利亚政治转轨和土保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地位有了实质性的提高,与主体民族的关系也由紧张走向和解。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问题一度非常严重,但没有演变成国家政治危机,也没有像南斯拉夫那样酿成大规模暴力冲突并发展为族际战争。作为巴尔干民族问题治理较为成功的案例,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可以为巴尔干乃至其他地区族际冲突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国外学者从民族政策、政治动员、司法机制、文化认同、政党制度等方面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进行研究,^①多集中在对1989年保加利亚驱逐土耳其族这一事件以及对保加利亚转轨后政党政

*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土耳其‘新奥斯曼主义’及其实践研究”(项目号:19CSS025)、中国社会科学基金西部项目“中东欧新成员国在欧盟的影响力及其对中欧关系的影响研究”(项目号:20XGJ012)的阶段性成果。本文感谢《世界民族》编辑老师和外审专家的修改意见,作者文责自负。

① 其中有代表性的研究有:Tomasz Kamusella, *Ethnic Cleansing During the Cold War: The Forgotten 1989 Expulsion of Turks from Communist Bulgar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9; Hüseyin Alptekin, “A Theory of Ethnic Violence: Ethnic Incorporation and Ethno-Political Mobilization in Bulgaria and Cyprus”, *Ethnic and Racial Studies*, vol. 40, no. 15, 2017; Tamer Köksal, Application of Transitional Justice Mechanisms: Post Assimilation Campaign Against the Turkish Minority in Bulgaria, *Uluslararası Hukuk ve Politika*, vol. 9, no. 34, 2013; Tomasz Kamusella, “Between Politics and Objectivity: The Non Remembrance of the 1989 Ethnic Cleansing of Turks in Communist Bulgaria”, *Journal of Genocide*, vol. 22, no. 4, 2020; Rossen Vassilev, “Bulgaria’s Ethnic Problem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02.

治的探讨。比较而言,相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政治和解的研究并不充分,对保加利亚政治转轨与民族和解二者关系的分析尚不多见^①,而对于影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走向的土耳其因素和欧盟因素的研究也不足。国内对这一问题的研究较少,尚缺乏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演变的系统性考察,对冷战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的政治和解,双方的政治互动缺乏研究。^② 本文拟梳理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政策变化及土耳其族的地位变迁,并分析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关系与土耳其族问题的复杂互动,进而探讨冷战结束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实现政治和解的过程和影响。

一、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由来与演变

保加利亚国内除主体民族保加利亚族外,还有土耳其人、波玛齐人^③、罗姆人^④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族群,其中土耳其人一直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大多为奥斯曼帝国晚期留在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后裔,讲土耳其语地方方言,信奉伊斯兰教,且主要为逊尼派,在历史、文化以及族裔方面都与土耳其存在密切的联系。土耳其族主要分布在保加利亚的东南部和东北部。^⑤ 根据保加利亚最近一次人口普查(2011年)数据,土耳其族人口数量为588318人,大约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8.8%,仍然为全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⑥

(一)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及土耳其族问题的历史由来

关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来源,学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的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土耳其族是奥斯曼帝国征服保加利亚后从安纳托利亚迁来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包括奥斯曼帝国在当地的驻军和官员、阿訇、商人以及农民;另一种看法认为,土耳其族是奥斯曼统治数百年中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⑦ 这两种观点的分歧在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土耳其人是否存在族裔联系。对此,土耳其学者多持第一种观点,而保加利亚学者大多认可第二种看法。两种观点源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对奥斯曼统治的历史及其遗产截然不同的叙事。土耳其人将奥斯曼帝国对包括保加利亚在内的东南欧的统治描绘为文化多元、宗教宽容与族群和谐的时代,而保加利亚则将这段历史视为充满血腥、暴力与奴役的“土耳其枷锁”岁月。如果把这两种观点结合起来,可能更加接近事实,即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既有奥斯曼帝国时期来自安纳托利亚的突厥移民,也有被土耳其化的斯拉夫人,而移民的后裔构成了今日土耳其族的基础。当然,也有人持第三种观点,认为其中一些土耳其族是中世纪早期突厥部落佩切涅格、乌古斯的后裔,早在13世纪已经定居保加利亚。^⑧ 不过,这种看法并不占主流。

^① Benedict DeDominicis, “The Bulgarian Ethnic Model: Post-1989 Bulgarian Ethnic Conflict Resolution”,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39, no. 3, 2011; Bernd Rechel, “The ‘Bulgarian Ethnic Model’—Reality or Ideolog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 7, 2007.

^② 马细谱回顾了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的形成和发展,并介绍了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对土耳其人问题的态度,但由于论文发表较早,未涉及冷战后保加利亚土耳其人问题的最新发展。参见马细谱:《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问题》,载《世界民族》,1996年第3期;赵彩燕对政治转型中的土耳其族人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未分析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的相互关系,而且忽视了欧盟这一关键因素。参见赵彩燕:《保加利亚的政治转型与民族和解》,载《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16年第1期。

^③ “波玛齐人”又称“波马克人”,保加利亚语发音更接近波玛齐,为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讲保加利亚语。

^④ “罗姆人”即“吉普赛人”,保加利亚的吉普赛人自称为罗姆人。

^⑤ 根据1993年保加利亚国家统计局数据,土耳其族人口比例较高的地区为:克尔贾利州南部(65.7%)、锡利斯特拉(33.5%)、舒门(30.3%)、拉兹格勒(47.4%)、特尔戈维什特(32.8%)。

^⑥ Kutlay Muzaffer, “The Turks of Bulgaria: An Outlier Case of Forced Migration and Voluntary Retur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5, no. 5, 2017. 2011年以后保加利亚再未进行全国范围内的人口普查。

^⑦ 这一观点成为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政府实行同化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的理论依据。

^⑧ Ali Eminov, “Turks and Tatars in Bulgaria and the Balkan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8, no. 1, 2000.

无论持何种观点,学界基本认可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主要形成于奥斯曼帝国统治时期。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保加利亚超过五百年。^① 作为奥斯曼帝国通往欧洲的主要通道,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属于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核心地带。从14世纪开始,奥斯曼土耳其人移居巴尔干,而保加利亚是移民较为集中的地区之一。18世纪俄国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主要对手,黑海和巴尔干成为俄国在欧洲扩张的重点方向。奥斯曼帝国出于战略原因,加强在保加利亚的力量,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安纳托利亚穆斯林移居保加利亚。在1877—1878年俄土战争爆发前,保加利亚1/3的人口为穆斯林,其中大部分为奥斯曼土耳其人,其他为波玛齐人、吉卜赛人和鞑靼人。奥斯曼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城镇,在主要城市人口中占多数。1878年俄土战争之后,奥斯曼帝国被迫给予保加利亚自治地位。1908年保加利亚宣布正式从奥斯曼帝国独立。至此,遗留在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彻底沦为少数民族。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与国内的土耳其族之间在族裔、宗教以及文化方面的差异根深蒂固,加之双方历史上形成的积怨,在特定的国内外形势下,经常表现为两个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不仅影响到保加利亚的政治进程,也成为影响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关系的重要问题。

(二)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引发的移民潮

受国际环境和保加利亚国内政治的影响,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少数民族的政策多变,引发了历史上出现土耳其族的间歇性移民潮。可以说,移民潮既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激化的表现形式,也是其结果之一。土耳其族移民的主要对象国为土耳其。除了历史和族裔联系外,由于保土两国山水相连,地缘也是影响土耳其族移民方向的重要因素。

战争是二战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国外的主要原因。1877年俄国向奥斯曼帝国宣战,从巴尔干半岛和高加索两个方向对奥斯曼帝国发动进攻。奥斯曼帝国战败,被迫承认保加利亚自治。居住在保加利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担心受到迫害,持续迁往奥斯曼帝国。到1900年,土耳其族已从1875年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33%降到14%。^② 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爆发后,奥斯曼帝国节节败退,巴尔干穆斯林^③大规模迁往安纳托利亚。其中约有20万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占领下的西色雷斯逃往奥斯曼帝国。1913年第二次巴尔干战争结束后,奥斯曼帝国与保加利亚签署了人口互换协议,有4.7万名保加利亚族从奥斯曼帝国迁往保加利亚,4.9万名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奥斯曼帝国。^④ 不过,人口互换协议涉及的土耳其族只占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很小的一部分,保加利亚境内仍然存在大量的土耳其族。

一战期间,奥斯曼帝国和保加利亚一同加入了以德国为核心的同盟国,双方关系有所缓和,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暂时进入休眠状态。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都有改善关系的愿望,两国于1925年再次签署人口互换协议,大约有10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土耳其。^⑤ 一战结束后,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继续通过各种途径外迁。相关数据显示,1923—1939年有

① 1363年奥斯曼军队直抵保加利亚,1393年奥斯曼帝国征服了保加利亚全境,正式将保加利亚纳入版图。

② [美] 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保加利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06页。

③ 奥斯曼帝国晚期,居住在巴尔干的穆斯林除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外,包括在奥斯曼时期整体皈依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人、被伊斯兰化的部分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此外,还包括鞑靼人、信仰伊斯兰教的吉普赛人等。巴尔干的土耳其族与其他穆斯林的主要区别在于讲土耳其语,其他穆斯林大多讲本民族语言,如保加利亚的波玛齐人讲保加利亚语。

④ Ahmet İğduygu and Deniz Sert, "The Changing Waves of Migration from The Balkans to Turkey: A Historical Account" in Hans Vermeulen(ed.), *Migration in the Southern Balkans: From Ottoman Territory to Globalized Nation States*, New York: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2015, p. 88.

⑤ Ayse Parla, "Marking Time along the Bulgarian-Turkish Border", *Ethnography*, vol. 4, no. 4, 2003.

将近 20 万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迁往土耳其^①,1940—1945 年有超过 1.5 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迁往土耳其。^② 虽然土耳其族不断外迁,但由于较高的出生率,再加上 1941 年南多布罗加从罗马尼亚并入保加利亚,居住在南多布罗加的土耳其人成为保加利亚国民,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人口数量仍然有所增加。

二战后,保加利亚政治体制和国家政策的变化成为土耳其族移民国外的直接原因。冷战时期,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出现了三次规模较大的移民潮,时间分别为 20 世纪 50 年代初、60 年代末至 70 年代末、80 年代中期至 80 年代末。1950 年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开始实行农业集体化和教育国家化,对宗教特别是伊斯兰教实行严格的管制,土耳其族的学校被关闭或者由国家控制。^③ 这一政策引发了土耳其族的普遍抵制。1950—1951 年,有 154393 名土耳其人离开保加利亚,前往土耳其。^④ 根据 1956 年人口普查结果,保加利亚人口总数为 7613709 人,其中土耳其族有 656000 人,土耳其族人口比例为 8.6%。^⑤ 1951—1968 年,由于保加利亚政府禁止移民,土耳其族的移民活动基本上停止。1968 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为期十年的《离散家庭协议》,允许亲属在土耳其的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和家人团聚。截至 1978 年,有 156000 名土耳其族移民土耳其。^⑥ 该协定于 1978 年期满后,土耳其族人的移民活动再次停止。

从 20 世纪 70 年代起,保加利亚政府实行新的民族政策,试图推动少数民族融入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以建立族裔同质的国家。这一政策在 1984—1985 年所谓的“复兴进程”^⑦中达到高潮。政府不再承认保加利亚存在少数民族,宣称境内所谓的“土耳其族”是奥斯曼帝国奴役保加利亚时被迫皈依伊斯兰教的保加利亚人的后裔,与现代土耳其人不存在族属关系。保加利亚领导人托多尔·日夫科夫宣布要像欧洲文艺复兴运动那样,帮助这些迷失的保加利亚人找到自己“真正的身份”。日夫科夫政府决定对国内的土耳其族实行强制改名和同化政策,土耳其族必须改用保加利亚或者斯拉夫名字。^⑧ 1984 年春,保加利亚政府批准了要求土耳其族改名的法令。同年 12 月,这一法令进入实施阶段。针对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包括:禁止用土耳其名字;禁止在公共场合讲土耳其语;禁止穿戴土耳其人和穆斯林的传统服饰;禁止出版土耳其语书籍;禁止土耳其歌曲和舞蹈;禁止土耳其族葬礼习俗和传统节日。1989 年土耳其族公开抵制同化政策,举行了广泛的示威活动,要求恢复自己的名字和身份。保加利亚政府将抗议运动领导人和很多土耳其族知识分子驱逐出境。1989 年 5 月,为“一劳永逸”地解决“土耳其人问题”,保加利亚政府向那些自认为是“土耳其人”的居民发放移民护照。这一政策导致了土耳其族从保加利亚大规模地外逃。到 8 月底,当土耳其政府关闭边境时,有 30 多万土耳其族离开保加利亚进入土耳其。^⑨

1989 年底,保加利亚政治局势发生变化。随着日夫科夫下台,保加利亚共产党中的改革派放

① Bilal N. Simsir, *The Turks of Bulgaria (1878 - 1985)*, Michigan: Rustem and Brother, 1988, p. 166.

② Ahmet İçduygu and Kemal Kirisci, *Land of Diverse Migrations*, Istanbul: Bilgi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

③ Beltan, S. B.,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Post-1980 Turkish-Muslim Immigrants from Macedonia*, Masters Thesis, Boğaziçi University, 2006, p. 25.

④ Ali Eminov, “The Turks in Bulgaria: Post-1989 Development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7, no. 1, 1999.

⑤ Ali Eminov, “The Turks in Bulgaria: Post-1989 Development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7, no. 1, 1999.

⑥ Beltan, S. B., *Citizenship and Identity in Turkey: The Case of the Post-1980 Turkish-Muslim Immigrants from Macedonia*, p. 21.

⑦ 当时保加利亚政府宣扬国内的土耳其人是历史上被强迫改宗的保加利亚人,要找回自己真正的信仰,实现文化上的复兴和重生。保加利亚语词汇为“Възродителен процес”,其中“Възродителен”可以翻译为复兴、再生、重生。

⑧ 1962 年、1971 年、1981 年保加利亚政府颁布法令要求穆斯林罗姆人、波马齐人改用保加利亚名字,这些措施几乎没有引起反对。参见 Elka Todorova, “Survival and Adjustment: The Main Ideology of Contemporary Bulgarians” in Jon Anson (ed.), *Ethnicity and Politics in Bulgaria and Israel*, Vermont: Avebury, 1993, p. 177.

⑨ Victor Bojkov, “Bulgaria’s Turks in the 1980s: A Minority Endangered”, *Journal of Genocide Research*, vol. 6, no. 3, 2004.

弃了原来的同化政策,部分之前迁往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开始回流。1989年11月后大约有15万人返回保加利亚,但仍有20多万人选择留在土耳其。^①保加利亚转轨初期,土耳其族集中分布的地区经济状况恶化。这些地区的土耳其族主要从事烟草种植和加工,苏联是其主要的出口市场。苏联解体后,这些地区的烟草出口受阻,很多土耳其族失去生活来源。此外,这些地区在基础设施方面本就相对落后,转向自由经济导致了通货膨胀和失业率上升。土耳其族聚集区经济形势的恶化使得土耳其族向外移民的活动再次开始,移民的主要方向为土耳其和欧盟国家。1989—1992年期间,有32万土耳其族移居土耳其。^②这次移民潮主要受经济因素驱动,大批土耳其族前往土耳其和西欧寻求就业机会。从1878年保加利亚“自治”到1984年“复兴进程”开始前,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土耳其的总人数将近72万。^③加上1989年移民土耳其的30多万土耳其族,保加利亚转轨前一百多年,有超过一百万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迁往土耳其。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移民活动,时间久、频度高、规模大,具有鲜明的特点。第一,移民潮与重大的历史事件密切相关,而且往往发生在穆斯林与基督徒关系紧张之际,移民的主要原因是躲避战争以及抗拒保加利亚政府民族政策的重大变化。第二,1946—1989年保加利亚共产党执政时期,保加利亚政府关于土耳其族的政策并不稳定,中间出现了几次反复。相对容忍与驱逐同化政策交替出现,但国家从未放弃将少数民族融入保加利亚主体社会的意图,而土耳其族则将土耳其视为精神祖国,固守自己的身份,抵制保加利亚政府的同化政策。第四,对于保加利亚政府而言,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多次向外移民,某种程度上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但移民无法根本性消除保加利亚政府的疑虑,也未能解决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与土耳其族的深层矛盾。较大的人口基数和高出生率使得土耳其族始终是保加利亚第一大少数民族。^④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族的强迫性移民不仅未能解决问题,还引发了与土耳其关系的紧张,甚至造成了自己在国际上的孤立。

(三)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地位问题

对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来说,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的矛盾集中表现为土耳其族的地位问题,政治地位和文化权利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核心诉求。保加利亚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独立以后,国内民族主义思潮盛行。不过,当时一系列的国际会议和相关法律赋予了保加利亚国内少数民族同等的政治地位和权利。1878年欧洲列强签署的《柏林条约》规定保加利亚境内的穆斯林享有同等的政治权利。^⑤1879年保加利亚宪法同样承认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非东正教徒的宗教自由。^⑥1919年《纳伊条约》重申了对保加利亚境内少数民族权利的保护。根据这一条约,保加利亚语虽然是官方语言,但是少数民族的母语也被允许使用,少数民族还可以开设自己的宗教机构和语言学校。^⑦1925年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签署友好条约,确认《纳伊条约》适用于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⑧

关于国内少数民族的法律地位,保加利亚宪法先后做了数次修改。1947年保加利亚宪法承认少数民族的存在,规定少数民族必须学习保加利亚语,同时也有接受母语教育和发展本民族文化的

① Darina Vasileva, “Bulgarian Turkish Emigration and Retur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6, no. 2, 1992.

② Lilia Petkova, “The Ethnic Turks in Bulgaria: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mpact on Bulgarian-Turkish Relations, 1947–2000”, *The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 vol. 1, no. 4, 2002.

③ Darina Vasileva, “Bulgarian Turkish Emigration and Retur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6, no. 2, 1992.

④ 1992年保加利亚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保加利亚总人口为7928901人,土耳其族人数为746664,占总人口的9.4%;2011年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土耳其族人口数量为588318人,大约占保加利亚总人口的8.8%。2011年之后,保加利亚未再开展人口普查。

⑤ Ali Eminov, “Islam and Muslims in Bulgaria: A Brief History”, *Islamic Studies*, vol. 36, no. 2, 1997.

⑥⑦ Yonca Köksal, “Minority Policies i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 Nat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6, no. 4, 2006.

⑧ 《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友好条约》(1925年11月18日), <http://www.forost.ungarisches-institut.de/pdf/19251018-1.pdf>.

权利。^① 1971年保加利亚对宪法进行修改,删除了“少数民族”的提法。1975年保加利亚公民的个人身份证上删除了“民族”一栏。^② 20世纪90年代,保加利亚开始政治经济转轨,司法方面也进行了根本性的改革,但是1991通过的新宪法没有提到“少数民族”一词,规定所有保加利亚公民,无论其宗教、种族差异,都平等享有法律规定的自由和权利,用公民的个人权利取代民族意义上的集体权利。^③

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一直保持着自己独特的语言和文化。保加利亚独立之后,留在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虽处境艰难,但仍然努力保持着自己独立的教育系统,由土耳其族社区参与办学,采用土耳其语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儿童基本上在土耳其社区的私立学校接受教育。这些学校提供的教育非常有限,资金和师资严重不足。只有大约50%的学龄儿童上过小学,其中许多人在完成小学教育前已经辍学。1905年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识字率只有4%。^④ 此后40年里,土耳其族的教育状况没有明显的改善。

在社会主义时期,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穆斯林和土耳其族的政策进行了多次调整。保加利亚共产党在执政初期实行了一些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权利的政策。1945年10月,保加利亚共产党通过法令恢复了早些时候被强行改名的所有穆斯林的名字。^⑤ 土耳其语学校的数量增加,土耳其族居住的主要城市出版了土耳其语的期刊和报纸。在土耳其族的教育问题上,保加利亚政府鼓励土耳其族的学校实行双语教学。1946年政府决定向土耳其族开设的学校拨款,允许土耳其族适龄儿童学习土耳其语,但必须同时学习保加利亚语。^⑥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保加利亚族人口增长几乎陷入停滞,而土耳其族人口迅速增长。1940—1960年,保加利亚农村地区穆斯林家庭的平均子女人数,从2名增加到3名。^⑦ 土耳其族人口的快速增长引起了保加利亚政府的警觉,成为保加利亚政府对国内土耳其族和穆斯林的政策显著变化的重要因素。从1955年开始,保加利亚高中土耳其语班被取消。1959年保加利亚政府决定将土耳其族运营的学校纳入保加利亚教育部管辖,土耳其语下降为选修课程。^⑧ 20世纪60年代穆斯林家庭平均子女人数进一步增加到5—6名。1968年保加利亚有8万名儿童出生,其中只有2.5万名是保加利亚族。^⑨ 面对其他族群人口的激增,保加利亚开始强化对非保加利亚族的融合。此后不久,保加利亚政府通过了将穆斯林整合进保加利亚社会的决议。

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关闭国内土耳其族开办的学校、报纸。1971年保加利亚共产党党章规定要创建统一的社会主义国家。1971年宪法通过后,建立语言和文化单一的民族国家成为明确的政府政策。对土耳其族等少数族裔同化的压力增强,已经土耳其化的保加利亚穆斯林被要求采用斯拉夫人的名字。^⑩ 1972年土耳其语课程被禁止,土耳其语书籍从书店和

① Kutlay Muzaffer, “The Turks of Bulgaria: An Outlier Case of Forced Migration and Voluntary Retur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vol. 55, no. 5, 2017, p. 10.

②③ Milena Mahon, “The Turkish Minority under Communist Bulgaria—Politics of Ethnicity and Power”, *Journal of Southern Europe and the Balkans*, vol. 1, no. 2, 1999.

④ Gabriela Fatková, “Revisit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urks’ in Bulgaria”, *Antrocom Onlin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8, no. 2, 2012.

⑤ Ali Eminov, “Turks and Tatars in Bulgaria and the Balkans”,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8, no. 1, 2000.

⑥ 1942年保加利亚政府开始强迫穆斯林改名和强行为新生儿起名,同时加强了对伊斯兰教的管理。

⑦ Rossen Vassilev, “Restoring the Ethnolinguistic Rights of Bulgaria’s Turkish Minority”, *Ethnopolitics*, vol. 9, no. 3, 2010.

⑧ Kemal Karpat, “The Turks of Bulgaria: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Religious Survival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3, no. 4, 1995.

⑨ Bilâl N. Simsir, *The Turks of Bulgaria (1878–1985)*, Michigan: Rustem and Brother, 1988, p. 268.

⑩ [美]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保加利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86页。

图书馆消失,土耳其电台广播也被停止,仅存的几份土耳其语报纸开始以双语版出版。

到20世纪80年代,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文化权利受到越来越严格的限制。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达到顶点。自1989年11月保加利亚转轨以来,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待遇大大改善,土耳其族人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得到法律的保障。

二、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关系中的土耳其族问题

作为奥斯曼遗产的一部分,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问题始终受到保加利亚与土耳其关系的影响。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以后,凯末尔将“土耳其人”界定为居住在土耳其共和国现有国界之内的国民,压制泛突厥主义和泛伊斯兰主义在国内的影响。凯末尔主义者在周边实行睦邻政策,尽力避免因为境外土耳其人而卷入与周边国家的冲突。然而,历史和地缘因素使得凯末尔及之后的领导人不能完全忽视境外的土耳其少数民族,尤其是与土耳其在血缘和文化方面最为密切的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族。1925年,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确认《纳伊条约》适用于土耳其少数民族。这一条约确认了保加利亚土耳其人少数民族的存在,并赋予土耳其与这一少数民族的法律联系。^①土耳其对外来移民的接纳程度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异。来自巴尔干的移民最受欢迎,在土耳其政治和社会中地位最高,被给予了最大程度的照顾和权利。^②土耳其社会普遍认为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土耳其族在血缘和文化上与土耳其联系最为密切。历史上,土耳其政府尽己所能,多次接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

二战后,保加利亚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成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的一部分,土耳其则继续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加入北约。社会制度的不同和阵营之间的对抗使得保加利亚和土耳其之间的土耳其族问题更加复杂。意识形态成为影响两国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态度的重要因素。保加利亚担心土耳其利用境外的土耳其族进行反共宣传。1947年保加利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警告国内的土耳其族不要成为保加利亚敌人的代理人。^③1950年8月10日,保加利亚契尔文科夫政府向土耳其发出一份措辞严厉的照会,要求土耳其在3个月内接收25万土耳其人。^④土耳其认为,这是苏东集团借此惩罚土耳其参加朝鲜战争,向土耳其施压。在土耳其看来,被驱逐的土耳其族大多来自土地最为肥沃、适于耕作的多布罗加,保加利亚政府通过驱逐土耳其族,获得了大量土地,以推进农业集体化。土耳其以经济难以承受为由,希望将每年接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控制在2.5万至3万人以内。这与保加利亚的要求相去甚远。1951年3月10日,保加利亚再次向土耳其发出照会,谴责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煽动叛乱。随后保加利亚向25万土耳其族发放通行证。1951年12月8日,土耳其政府被迫关闭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边界。1950—1951年,15万保加利亚移民被赋予了土耳其公民权,他们大部分是保加利亚农业集体化的受害者,后来成为反对共产主义的坚定支持者。在土耳其政府看来,来自保加利亚的大规模移民本身就是资本主义的土耳其优于社会主义的保加利亚的有力例证。^⑤在1951—1963年的12年中,保加利亚与土耳其的关系跌入低谷。保加利亚禁止

^① Yonca Köksal, “Minority Policies i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Struggle to Define A Nation”,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6, no. 4, 2006.

^② Parla Ayse, “For us, Migration is Ordinary: Post-1989 Labour Migration from Bulgaria to Turkey”, in Hans Vermeulen (ed.), *Migration in the Southern Balkans: From Ottoman Territory to Globalized Nation States*, 2015, p. 108.

^{③④} Lilia Petkova, “The Ethnic Turks in Bulgaria: Social Integration and Impact on Bulgarian-Turkish Relations, 1947 – 2000”, *The Global Review of Ethnopolitics*, vol. 1, no. 4, 2002.

^⑤ Parla Ayse, “For us, Migration is Ordinary: Post-1989 Labour Migration from Bulgaria to Turkey”, in Hans Vermeulen (ed.), *Migration in the Southern Balkans: From Ottoman Territory to Globalized Nation States*, 2015, p. 109.

境内的土耳其族移民国外。1958年,保共中央召开特别会议,开始对少数民族文化权利实施更加严格的政策。1964年“约翰逊信件”^①曝光后,土耳其与美国关系出现裂痕,开始寻求改善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在这一背景下,土耳其与保加利亚的关系回暖,1968年双方达成协议,保加利亚允许国内土耳其族前往土耳其与其家人团聚。

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在塞浦路斯问题上土耳其的强硬政策是促成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政策变化的重要因素。1974年1月,保加利亚国防部称土耳其准备以代号 Kılıç (剑)对希腊发动进攻。保加利亚政府怀疑土耳其可能利用海外土耳其人,作为未来领土扩张的手段。同年2月,保共中央通过了一项决议,通过政治宣传使保加利亚土耳其族“更好地融合”。这些措施包括为穆斯林改名、关闭清真寺。^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保加利亚日夫科夫政府对国内的土耳其族实行规模空前的同化政策。这一政策的出台受到国内外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中,土耳其人的高出生率使得保加利亚政府非常担忧。^③有学者认为,鼓吹民族主义可能会增加国内民众对政府的支持和掩盖保加利亚的经济困境。^④更多的学者认为塞浦路斯问题爆发后,土耳其出兵占领塞浦路斯北部,使得保加利亚担忧土耳其利用境外土耳其族在巴尔干扩张。日夫科夫在1997年出版的回忆录将发起“复兴进程”政策归咎于土耳其,宣称土耳其政府暗地里在保加利亚穆斯林中推行“泛突厥”运动,煽动分离主义,因此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⑤

1983年图尔古特·厄扎尔担任土耳其领导人时,在内政和外交方面做了重大调整。与凯末尔主义者的看法相反,厄扎尔代表的一批精英对于“土耳其人”边界的看法发生了变化,认为生活在伊拉克、保加利亚、高加索的土耳其人乃至中亚的突厥人在文化、历史和种族方面与土耳其民族存在密切联系,即土耳其民族不再局限于安纳托利亚和土耳其共和国的现有疆界。^⑥厄扎尔不再将境外土耳其人视为负担,认为生活在其他国家的“同胞”是土耳其在国际上增强影响力的重要资产。厄扎尔政府密切关注保加利亚局势和土耳其族的处境。1984年保加利亚政府发起的“复兴进程”遭到了国内土耳其族各种形式的抵制。1985年夏成立的“保加利亚土耳其人民族自由运动”进行了暴力抗议,在一些地区引爆炸弹。同年5月,保加利亚东北部的土耳其族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保加利亚政府出动军队镇压,大约有20—35名示威者死亡,数百人受伤。^⑦组织抗议活动的土耳其族大多被强制要求移民或者投入监狱。

对此,土耳其政府除了直接和保加利亚进行外交交涉以外,还在国际上发起一系列外交活动,谴责保加利亚政府对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争取国际舆论的支持。保加利亚则认为本国穆斯林社区的事务纯属内部事务。1985年4月,保加利亚外交部巴尔干司司长柳博米尔·肖波夫在记者招待会上宣称,保加利亚境内所谓的“土耳其人”与土耳其之间没有任何联系,“土耳其没有任何历史权利……”也没有任何其他理由声称保加利亚境内存在‘土耳其少数民族’或‘土耳其同胞’。^⑧

① 1964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逊写信给土耳其总理伊诺努,威胁如果土耳其不取消对塞浦路斯岛的军事干预计划,北约将取消对土耳其的军事保护。这一事件严重动摇了土耳其对美国的信任,美土联盟出现裂痕。

② Tonka Kostadinova, “60 Years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Greece and Bulgaria: Challenges and Benefits of the Reconciliation Process”, *Südosteuropa*, vol. 62, no. 3, 2014.

③ Darina Vasileva, “Bulgarian Turkish Emigration and Return”, *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6, no. 2, 1999.

④ [美]克兰普顿著,周旭东译:《保加利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192页。

⑤ Rossen Vassilev, “Restoring the Ethnolinguistic Rights of Bulgaria’s Turkish Minority”, *Ethnopolitics*, vol. 9, no. 3, 2010.

⑥ Muhittin Ataman, “Özal Leadership and Restructuring of Turkish Ethnic Policy in the 1980s”,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8, no. 4, 2002.

⑦ Kemal Karpat, “The Turks of Bulgaria: The Struggle for National-Religious Survival of A Muslim Minority”, *Nationalities Papers*, vol. 23, no. 4, 1995.

⑧ Ali Eminov, *Turkish and Other Muslim Minorities of Bulgaria*, New York: Hurst Company, 1997, p. 196.

1985年12月,土耳其向联合国申诉,要求保加利亚停止迫害土耳其族。联合国要求向保加利亚派出独立的代表团,但被保加利亚拒绝。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复兴进程”达到高潮时,土耳其也未采取支持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进行暴力抗争的政策,对土耳其族的支持是有限的、克制的。

1989年底,保加利亚国内外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复兴进程”难以为继。保加利亚新政府最终放弃了对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困扰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双边关系的最大障碍得以消除。1990—1994年,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签署了几份睦邻友好条约和安全合作条约,双方一致同意从两国边境撤军。^①土保双边关系的改善为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解决创造了积极的氛围,土耳其族在争取政治和文化权利方面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实现历史性和解。1997年,保加利亚总统彼得·斯托扬诺夫访问土耳其,为保加利亚在20世纪80年代粗暴对待国内土耳其族的行为道歉。^②土耳其积极支持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和欧盟,两国关系极大地改善。

此后,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关系总体稳定,两国成为彼此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1997年12月两国签署协定,解决了保加利亚和土耳其的陆地边界和黑海领水的划界问题。1999年1月1日,两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然而,土耳其族问题仍然是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关系中的敏感问题。2002年正义与发展党在土耳其执政后,对境外土耳其族的重视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正发党政府将加强与境外土耳其族的联系作为一项重要政策,把移民视为增强土耳其海外影响力的战略资产。^③2012年土耳其政府发行了一本名为《+90》^④的季刊,发布关于海外土耳其人的信息和新闻,其中一个主要栏目《移民记忆》中有大量关于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移民的报道。^⑤

土耳其族问题还影响到土耳其和保加利亚两国的国内政治。至今仍有20万持保加利亚护照的土耳其族在土耳其定居,但在保加利亚选举期间,他们当中很多人会返回保加利亚参加投票。对此,保加利亚国内的民族主义者颇为不满。此外,土耳其大选期间,埃尔多安在海外土耳其族中的“拉票”行为也引起了保加利亚的反感和疑虑。保加利亚总统鲁门·拉德夫指责土耳其“干涉”保加利亚内政,表示索菲亚不会接受。^⑥尽管目前两国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水平,但是围绕土耳其族问题,两国关系中仍有一些杂音。保加利亚民众仍然对“土耳其族问题”非常敏感,对于土耳其族政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疑虑并未消除。

三、转轨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问题的治理与民族和解

日夫科夫政府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反而严重损害了保加利亚的国家形象,使保加利亚在国际上陷入孤立。美国和欧共体多次要求保加利亚停止对少数民族的迫害。苏联和东欧国家在这一问题上也没有给予保加利亚坚定的支持。^⑦除了国际上的压力,对于所谓

① Nihat Çelik, “The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of Turkish Minority in Bulgaria and the Public Reaction: The Case of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1990 – 1994)”, *Karadeniz Arastirmalari*, vol. 6, no. 22, 2009.

② Michael Bishku, “Turkish-Bulgarian Relations: From Conflict and Distrust to Cooperation over Minority Issues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Mediterranean Quarterly*, vol. 14, no. 2, 2003.

③ Zeynep Sahin Mencutek, “Mobilizing Diasporas: Insights from Turkey’s Attempts to Reach Turkish Citizens Abroad”, *Journal of Balkan and Near Eastern Studies*, vol. 20, no. 1, 2018.

④ 90为土耳其国际区号。

⑤ Damla Aksel, “Kins, Distant Workers, Diasporas: Constructing Turkey’s Transnational Members Abroad”, *Turkish Studies*, vol. 15, no. 2, 2014.

⑥ “Erdogan Slams ‘Pressure’ on Turks in Bulgaria ahead of Vote”, 2017-03-23, <https://middle-east-online.com/en/erdogan-slams-pressure-turks-bulgaria-ahead-vote>.

⑦ Peter Stamatov, “The Making of a ‘Bad’ Public: Ethnonational Mobilization in Post-Communist Bulgaria”, *Theory and Society*, vol. 29, no. 4, 2000.

的“复兴进程”,国内也存在反对的声音。一些保加利亚族知识分子认为这是专制政权腐败的一种表现。^① 1989年7月17日,保加利亚121名知识分子签署公开信,对日夫科夫的民族政策进行了尖锐地批评,强调所有人都有权确定自己的民族和宗教身份,要求政府必须立即放弃旧有的政策。^② 土耳其族要求撤销同化政策并赔偿在改名运动中土耳其族遭受的迫害,并为此发起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成为1989年保加利亚国内反政府抗议活动的先导。

(一) 转轨后保加利亚对土耳其族的政策

1989年11月10日,在保加利亚执政33年的日夫科夫被迫辞去共产党中央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保加利亚共产党内的改革派掌握了权力。12月29日,保共中央讨论民族问题,指出日夫科夫在1985年以来实行的同化土耳其族的“复兴进程”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违背了宪法,破坏了民族团结,宣布恢复土耳其族人的土语名字,并赦免因抵抗这场运动而被监禁的人。^③ 保共内部改革派主导的新政府迈出了民族和解的第一步。

保共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在全国引发了民族主义者的反对。决议通过的第二天,部分地方政府无视中央政府的命令,反对关于恢复土耳其族土语名字和追回以低价出售的土耳其族财产的决议。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在保加利亚东南部成立了“维护国家利益委员会”,并在卡扎里市举行大规模示威,反对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④ 随后几天,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混居城镇也发生了类似的示威和罢工。抗议者还在首都索菲亚进行了近两周的集会,要求取消12月29日的决定。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声称,这项决定是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做出的,没有充分考虑保加利亚人民的意见,因此是不民主的,敦促就这个“国家问题”举行全民公投。保加利亚族的民族主义动员引起了反对它的组织的反动员,其中最突出的是非民族主义知识分子组织的人权团体和土耳其族的大规模动员。改革派主导的新政府拒绝了民族主义者提出的要求,认为人权问题不能通过全民公决解决。保加利亚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也公开支持政府在民族问题上的立场。

为避免局势升级,保加利亚政府与各种政治势力和社会团体组成“公民社会委员会”,于1990年1月举行了旨在结束民族冲突和恢复社会秩序的紧急会谈。委员会囊括了保加利亚政治谱系中各种派别,最终达成妥协,签署了一份草案,谴责了过去对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权利的侵犯,承诺恢复土耳其族的名字和宗教自由,但反对民族分离主义,拒绝土耳其族自治,并确认保加利亚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至此,全国范围内的抗议和罢工暂时结束。此后不久,保加利亚议会批准了这一草案,宣布特赦在“复兴进程”中被判刑的公民。^⑤ 尽管保加利亚民族主义势力与土耳其族存在严重分歧,但是双方都承认和解和合作对国家的和平稳定至关重要。民族主义对新的民族和解政策的挑战被初步遏制。

1990年3月,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再次在民族混居地区举行示威游行,认为政府在少数民族权利问题上让步太多。土耳其族和其他穆斯林同样在首都发起抗议活动,要求政府解决返回保加利亚的土耳其族面临的就业、住房和教育困难。政府组织成立了一个名为“民族问题公共委员会”的政治磋商结构,其中包括执政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党、土耳其族人组建的“权力与自由运动”、主

^① Oran Baskin, “Religious and National Identity among The Balkan Muslims: A Comparative Study on Greece, Bulgaria, Macedonia and Kosovo”, *Cemoti*, vol. 1, no. 18, 1994.

^② Emin Atasoya and Abdullah Soykan, “Freedom walk of the Turks in Bulgaria: Events of May in 1989 and Their Reflections”,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no. 19, 2011.

^③ 马细谱:《保加利亚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286页。

^④ Rossen Vassilev, “Bulgaria’s Ethnic Problems”, *East European Quarterly*, vol. 36, no. 1, 2002.

^⑤ 特赦不包括那些引爆炸弹的土耳其族。

要反对派“民主力量联盟”、工会和其他相关公共组织的代表。“民族问题公共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各方保持冷静和宽容。保加利亚政府不得不在主体民族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土耳其族的权利诉求之间进行平衡。不同民族宗教团体之间的协商和合作机制最终缓和了双方的敌意,使得民族之间的冲突能够在体制渠道内进行,逐渐将最初的爆炸性分歧化解为妥协性解决方案。

随着政治转轨的推进,土耳其族的地位提高,语言、教育和文化权利扩大。到1991年春,保加利亚政府批准了60万项恢复穆斯林姓名的请求。1991年6月通过的法案宣布,那些因为拒绝改名而被判刑的人在政治和公民权方面的权利得到了恢复。1991年通过的新宪法第36条第2款规定“凡母语不是保语的公民在必须学习保语的同时,有权学习和使用自己的语言”^①,确认了非保加利亚血统的公民有学习和使用母语以及发展本民族文化的权利。1991年11月政府发布法令,规定三年级到八年级的学生每周可以学习4个小时的本民族语言选修课。同年12月,保加利亚教育部宣布,从1992年2月开始,将在土耳其族学生占多数的学校开设土耳其语必修课,在土耳其学生占少的学校开设土耳其语选修课。1994年保加利亚教育部允许所有少数民族学生都可以每周上4个小时的母语课程,并将授课时间放宽到整个小学阶段。1990年保加利亚《新光明报》改为保加利亚语和土耳其语双语发行,不久出现了一批土耳其语的报刊。保加利亚国家电视台于2000年10月2日首次开播了土耳其语新闻节目。^②

土耳其族的宗教自由得到法律保护。保加利亚通过立法规定个人宗教信仰自由。社会主义时期关闭的伊斯兰学校重新开放,一些伊斯兰宗教学校得到修复,还出现了一批新的宗教学校。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也被允许建立伊斯兰宗教学院。1992年底,保加利亚开放的清真寺接近1000座,比1989年的300座大幅增加。^③政府还取消了对伊斯兰教宗教文本的出版、进口和销售的限制。土耳其语版本的宗教经典被允许合法销售。穆斯林可以自由庆祝重要的宗教节日,举行传统的婚礼和葬礼。

土耳其族的政治权利也得到保障,保加利亚政府同意代表土耳其族利益的政党参与保加利亚的政治和选举。艾哈迈德·多甘于1990年1月组建了以土耳其族为主体的“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为保加利亚最大和最有影响力的少数民族政党。“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是持中间立场的党派,主要目标是保护保加利亚的少数族裔,特别是土耳其族的权利。“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立以后,积极参与议会选举,在历届选举中一直稳居议会前四大政党之列,在保加利亚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2001—2009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其他政党组成联合政府,其成员出任了多位政府部长。2013—2014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与保加利亚社会党联合执政。2014年议会选举中,这一政党得到了3%的保加利亚族、83%的土耳其族和44%的吉卜赛人的支持,在议会选举中获得38个席位,赢得14.84%的得票率,成为议会第三大党。^④“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欧盟也有较大的影响,在欧洲议会中占有4个席位。^⑤“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2022年选举中获得13.66%的选票,再次保持了议会第三大党的地位。目前,除了“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外,保加利亚还有三个土耳其族人组成的小党:民主阵线运动、民主和正义党、保加利亚土耳其人联盟,这三个

① 《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通过),载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751页。

② Rossen Vassilev, “Restoring the Ethnolinguistic Rights of Bulgaria’s Turkish Minority”, *Ethnopolitics*, vol. 9, no. 3, 2010.

③ Ivaylo Grouev, “The Bulgarian Model, Recent Developments in the Ethnic Landscape: An Interview with Mr Ahmed Dogan, Chairman of the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European Security*, vol. 6, no. 2, 1997.

④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Movement_for_Rights_and_Freedoms

⑤ “Bulgaria’s Movement for Rights and Freedoms Puts Peevski on European Parliament Candidate list”, <https://sofiaglobe.com/2019/04/22/bulgarias-movement-for-rights-and-freedoms-puts-peevski-on-european-parliament-candidate-list/>

党组成巴尔干民主联盟,但在选举中未能达到跨过4%的议会门槛。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主流政治派别温和的态度和策略在民族和解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权利与自由运动”在坚持文化权利的同时,反对任何形式的分离主义和自治主张。保加利亚主流社会一直担忧“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为土耳其在保加利亚的“第五纵队”。为了避免引发保加利亚族的强烈反应,艾哈迈德·多甘一再宣传该党以保加利亚的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在涉及土耳其的问题上态度谨慎。2013年1月19日,卢特菲·梅斯坦当选为“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第二任主席。2015年土耳其击落俄罗斯的战斗机后,卢特菲·梅斯坦公开表态支持土耳其,在保加利亚引发争议。在党内仍有巨大影响的艾哈迈德·多甘通过中央委员会,于2015年12月24日解除了卢特菲·梅斯坦的党主席职务。土耳其领导人埃尔多安则将艾哈迈德·多甘列入黑名单,禁止他入境土耳其。总体来说,“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成立以后,其领导层是清醒、克制的,一直强调自由主义和亲欧洲主义是自己的核心理念。他们没有发起独立运动,甚至没有推动保加利亚政府承认土耳其族是少数民族。^① 该党始终在宪法和民主框架之内争取基本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只是要求承认土耳其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的平等权利,致力于与所有其他公民平等地参与该国的政治、社会、经济和宗教生活。

(二) 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治理中的潜在问题

尽管保加利亚在加入欧盟前后进行了多项改革,在制度和法律方面保护少数族裔权利,但是民族主义情绪和歧视少数族裔的声音在保加利亚仍然存在。2005年保加利亚议会选举中,公开鼓吹民族主义的极右翼政党阿塔卡党获得了8.1%的选票,在议会中占有21个席位。^② 其领导人沃伦·锡德罗夫以反土耳其人、反吉卜赛人为口号,在2006年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中吸引了高达24%的选票。^③ 媒体认为锡德罗夫是与法国极端民族主义者勒庞类似的人物。阿塔卡党的主要支持者来自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和对转轨后出现腐败等社会问题不满的年轻人。2007年阿塔卡党在欧洲议会中获得了两个席位。2009年阿塔卡党在议会选举中赢得9.3%的选票。^④ “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给外界土耳其族政党的印象,但事实上它的党员和支持者绝大部分来自土耳其族。2009年它在保加利亚族中只有1.6%的支持率。^⑤ 保加利亚的极端民族主义政党和右翼政党多次攻击“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在选举中舞弊,称有不少居住在土耳其的保加利亚土耳其族在选举中返回保加利亚投票。

横亘在土耳其族和保加利亚族之间的历史积怨和心理鸿沟不会轻易消除,对彼此的疑虑依然真实存在。历史上强迫同化政策的创伤增加了土耳其族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之间的心理距离。保加利亚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关系仍然是疏离的,双方在日常生活中的接触非常有限。在很大程度上,土耳其族把与保加利亚族的接触限制在正式场合和工作场所。土耳其族生活在独立的社区,日常交际和语言也基本使用土耳其语。^⑥ 未来在经济和社会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的民族主义者可能煽动仇外心理和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将土耳其族视为“替罪羊”,试图通过保持族群关系的紧张来保持主体民族的“团结”。土耳其族问题的彻底解决仍然需要各方的共同努力。

① Bernd Rechel, “The ‘Bulgarian Ethnic Model-Reality or Ideology?’, *Europe-Asia Studies*, vol. 59, no. 7, 2007.

② Gabriela Fatková, “Revisiting the Conceptualization of ‘Turks’ in Bulgaria”, *Antrocom Online Journal of Anthropology*, vol. 8, no. 2, 2012.

③ Nikolai Genov, “Rad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Bulgaria”,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 no. 2, 2010.

④ Cholova, B. & De Waele, “Bulgaria: A Fertile Ground for Populism?”, *Slovak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s*, vol. 11, no. 1, 2011.

⑤ Nikolai Genov, “Radical Nationalism in Contemporary Bulgaria”, *Review of European Studies*, vol. 2, no. 2, 2010.

⑥ Maya Kosseva and Marko Hajdinjak, “Voting Rights of Bulgarian Minorities: Case of Roma and of Bulgarian Turks with Dual Bulgarian-Turkish Citizenship”, *IMIR Political Life Final Country Reports*, 2012, p. 29.

四、欧盟对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的影响

欧盟对于候选成员国的入盟标准几乎影响了中东欧国家国内政策的各个领域,包括其少数民族政策。1993年6月,哥本哈根会议上欧洲理事会制定了成员资格标准,即“哥本哈根标准”。其中有一条规定:候选国必须保障民主、法治、人权,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从1998年开始,欧洲委员会每年都会发表关于候选国进展情况的年度报告,该报告成为监测候选国入盟进程的重要手段。2000年欧盟通过了非歧视条款,要求候选国家将非歧视原则纳入国家立法。其中“种族平等”条款禁止候选国基于种族差异,在就业、培训、社保、教育和公共服务方面进行直接和间接歧视。这一条款要求欧盟12个成员国必须在2003年7月19日之前实施这一法令,欧盟候选国也必须效仿。^①正是欧盟的指令促使中东欧国家通过了反歧视立法。欧盟虽然没有硬性要求入盟候选国加入《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②,但它表达了对候选国加入的期望,这对候选国具有潜在的约束和影响。保加利亚1999年获得欧盟候选国地位,并在2007年最终加入欧盟,这对保加利亚民族问题的解决发挥了积极影响。欧盟设定的入盟条件有助于遏制保加利亚国内政治中的民族主义和对少数族裔的歧视倾向。

欧盟是保加利亚少数民族政策改变的关键因素。1995年12月14日,保加利亚正式申请加入欧盟。在1995年所有其他中东欧国家签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之后,保加利亚面临着巨大的压力。保加利亚国内对批准这一公约进行了激烈的辩论,保加利亚族民族主义者反对承认国内存在少数民族。欧盟在1999年的报告中认为,所有中东欧候选国家都符合政治标准,但是其中一些国家在人权和少数民族保护方面仍需取得进展^③,这带有明显的督促和告诫保加利亚的含义。保加利亚为了尽快达到入盟标准,出台了一些保护国内少数族裔权利的政策。在欧盟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各主要政党最终就批准《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达成一致意见,1999年5月7日保加利亚议会正式批准了这一公约。欧盟委员会在2000—2002年的年度报告中一再提醒保加利亚,需要在反对种族歧视方面做出进一步的改变。2003年9月16日,保加利亚按照欧盟的要求,通过了《反歧视保护法》。

在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上,欧共体/欧盟直接发挥了积极的作用。早在保加利亚转轨之前,欧共体就在土耳其族问题上向保加利亚施压。1989年8月,欧洲议会通过一项决议称,如果保加利亚继续虐待国内的土耳其族公民,欧洲议会将对保加利亚采取经济制裁^④。保加利亚开始转轨后,1991年10月,93名议员根据新宪法第11条“不得以种族、人种或宗教信仰为基础建立政党”^⑤的规定,要求取缔“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1992年宪法法院以基于种族原因取缔一个政党属于种族歧视,并且违反欧洲宪法和《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为由驳回了这一要求,“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得以继续存在。1999年保加利亚成为欧盟候选国后,欧盟的影响变得更加直接和明确。^⑥进入21世纪以后,保加利亚科斯托夫政府根据1999年与欧盟签署的入盟进程框架协议,采取进一步的

①③ Bernd Rechel, “What Has Limited the EU’s Impact on Minority Rights in Accession Countries?”, *East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ies*, vol. 22, no. 1, 2008.

② 这是欧洲委员会通过的关于少数民族保护的区域性法律文件中最全面的一个公约,并且是第一个致力于将少数民族保护作为人权保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参见廖敏文:《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评述》,载《民族研究》,2004年第5期。

④ Papadimitriou and Gateva, “Between Enlargement-Led Europeanization and Balkan Exceptionalism: An Appraisal of Bulgaria’s and Romania’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0, no. 2, 2009.

⑤ 《保加利亚共和国宪法》(一九九一年七月十二日通过),载姜士林等主编:《世界宪法全书》,青岛出版社,1997年,第749页。

⑥ Papadimitriou and Gateva, “Between Enlargement-Led Europeanization and Balkan Exceptionalism: An Appraisal of Bulgaria’s and Romania’s Entry into the European Union”, *Perspectives on 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 vol. 10, no. 2, 2009.

措施使少数民族权利制度化。^①

欧盟还直接在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关系上施加影响,支持两国改善关系。欧盟成员国身份是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共同的政策目标。除了政治和经济标准外,候选成员国与周边国家不存在领土争端也是入盟的潜在标准。为了加入欧盟,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国内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也致力于改善彼此的关系。土耳其一开始就对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转轨持欢迎态度,并支持保加利亚加入北约。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在入盟问题上相互支持。对于保加利亚来说,土耳其加入欧盟接受欧盟的约束,符合保加利亚的利益。冷战时期土耳其为保护离散土耳其人而出兵塞浦路斯的举动一度让保加利亚非常担心。保加利亚对国内土耳其族的同化政策,背后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安全感的缺乏。欧盟被设想为安全提供者,如果两国都成为欧盟成员国,保加利亚对土耳其可能自行其是的担忧将大大缓解。而安全顾虑的缓解有助于保加利亚在国内采取更加包容的少数民族政策。欧洲一体化也得到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的支持。“争取权利与自由运动”的领导人艾哈迈德·多甘坚信保加利亚土耳其族的权利在欧洲-大西洋结构中能得到最好的维护。^②正是在共同的欧洲愿景下,保加利亚国内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相互妥协,推进两族的政治和解进程,以便更加顺利地加入欧盟。近些年来,欧盟多次肯定了保加利亚在少数族裔政策上的进步,甚至已经不再将保加利亚土耳其族视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综上,欧共体/欧盟的规范力量在解决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上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冷战结束前后,保加利亚开始政治经济转轨,以“回归欧洲”为主要战略方向。保加利亚亟须在各个方面满足欧共体/欧盟的入盟标准,树立新的国家形象。欧共体/欧盟通过经济援助、政策引导和制度规范,一方面促使保加利亚调整对外政策,改善与土耳其等周边国家的关系,另一方面对保加利亚的国内政治施加影响,推进保加利亚的民主改革。入盟前景要求保加利亚政府改善国内土耳其族的处境并与土耳其族和解。正是在欧共体/欧盟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出台保护少数族裔权利的系列文件,宪法法院否决了保加利亚民族主义者要求取缔土耳其族政党的要求。在保加利亚民族和解进程中,欧共体/欧盟的规范性力量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某些时刻甚至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五、结 语

历史上保加利亚政府多次采取对土耳其族等少数民族的歧视和同化政策,土耳其族和保加利亚族的关系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冷战后保加利亚没有像前南斯拉夫地区那样出现族群间的暴力冲突。随着保加利亚政治转轨和保土两国关系的改善,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之间实现政治和解。土耳其族地位提高,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政治和文化权利,并积极参与保加利亚的议会选举,成为保加利亚政坛当中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尽管保加利亚仍然存在民族问题,罗姆人依旧遭到社会的歧视,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之间的疏离依然存在,但是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已经不再被认为是影响国家政治的重要问题。

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之间的相互谅解和妥协是民族和解的基础。土耳其族精英的态度和策略无疑起了重要作用。“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采取了克制和务实的态度,始终强调合法维权而非暴力对抗的理念,抵制了土耳其族内部要求从保加利亚分离或者并入土耳其的激进主张,坚

^① Dia Anagnostou, “Nationalist Legacies and European Trajectories: Post-Communist Liberalization and Turkish Minority Politics in Bulgaria”, *Southeast European and Black Sea Studies*, vol. 5, no. 1, 2005.

^② Osman Koray Ertas, *Identity Conflict in Bulgaria: The Dynamics of Non-Violence*, Ph. D Thesis,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2016, p. 103.

持走议会斗争的道路。在“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的影响下,土耳其族坚持在公共场合使用土耳其语和在学校学习土耳其语的权利,但是承认保加利亚语为唯一的官方语言,普遍认同土耳其族公民应在与保加利亚人平等的基础上融入保加利亚社会。保加利亚改革派精英也做出了很多让步和妥协。政府承认了包括土耳其族在内的少数民族的政治和文化权利,但是拒绝了土耳其族激进势力要求自治的主张。虽然没有提到追究“复兴进程”领导者的责任,但保加利亚政府在这方面做出和解的姿态,公开否定和批判“复兴进程”并向土耳其族道歉。对于在公立学校开设土耳其语课程的问题,政府最终决定在公立学校将土耳其语列为选修课,对每周课时安排做了限制,也是双方妥协的结果。

保加利亚的民族和解与保加利亚转轨、入欧以及保土两国关系改善,基本上是同步的过程。保加利亚土耳其族问题形式上表现为土耳其族的地位和权利问题,但其实质仍然是认同问题。保加利亚转轨过程中,通过制度性安排将土耳其族纳入新的国家政治体系,赋予土耳其族完整的公民权、政治参与权和文化语言权利,加强了土耳其族对保加利亚国家共同体的认同,同时保加利亚主体民族和土耳其族都支持入欧立场,将欧洲认同作为国家认同之外的另一个共有的身份认同。土耳其和保加利亚共同的欧盟愿景也改善了两国关系,为土耳其族与保加利亚主体民族的和解奠定了基础。保加利亚转轨中保加利亚土耳其族与主体民族的关系由紧张走向和解,为巴尔干族群关系带来新的希望,即存在历史积怨的种族和宗教群体之间有可能实现全面和解。历史不能忘记,但可以超越。民族国家可以褪去神话的色彩,可以重新想象为多样性、包容性的政治空间。族群和宗教问题也并非巴尔干地区稳定与和平不可逾越的障碍。

Abstract The Turkish ethnic issue has always been an important problem influenc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of Bulgaria, and also a key issue affec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changes of Bulgarian policy towards domestic Turks led to intermittent emigrations of Turks in history. In the mid-1980s, Bulgaria's policy forcing domestic Turks to rename and be assimilated severely soured Turkish-Bulgarian relations and triggered one of the largest waves of international emigration since World War II. After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with the beginning of Bulgaria's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Bulgaria and Turkey, the policy of Bulgaria towards the domestic Turks changed fundamentally. Since then, the status of the Turkish ethnic group in Bulgaria has been substantially improved and their political reconciliation has been achieved with the majority ethnic Bulgarians.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learned from Bulgaria's governance of the Turkish ethnic issue provide useful insights for the resolution of similar ethnic problems.

(张向荣, 讲师, 西北大学中东研究所, 西安, 710127)

[责任编辑: 黄凌翅]